



## 兵 缘

程 1 杨滨

### 第一桶金

在清华上大四（1984 年下半年）时，我参加了“清华大学未来学会”，会长陈明星（电机系 80 级）任命我为兵法部部长（20 岁就当部长，有点少年得志的赶脚）。

当上部长后，先是招兵买马，很快招募到了几位核心成员，其中有无无线电系 83 级的翦进和付首清，计算机系 83 级的丁晓健等。然后举办各种活动，其中一次请了军事科学院的程金明研究员到学校做了题为“拿破仑战争”的讲座。

这里还有一段插曲：我们最初是想请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将军（55 年的上将）来清华的，于是我和翦进骑自行车去了军科。哨兵让我们登记，问我们找谁。我回答找宋时轮院长，这可把哨兵吓一跳，问我们是干啥的。我底气十足地回答：清华大学兵法部，我是部长。当时以为部长和院长差不多平级呢。哨兵乐了，直接告诉我宋院长不在，把我们打发走了。

后来我们看了一本书《拿破仑军事战争》，作者是军科院外军部的程金明。于是我们再次骑自行车去了军科。这次哨兵挺客气，让我们进去见了程老师。程老师很痛快，答应去清华讲座并敲定了时间。

办完几次活动后，一个问题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：活动经费。学校只给笔和纸，经费一分都没有。我们开会研究了几次，最后决定放录像！放战争题材的片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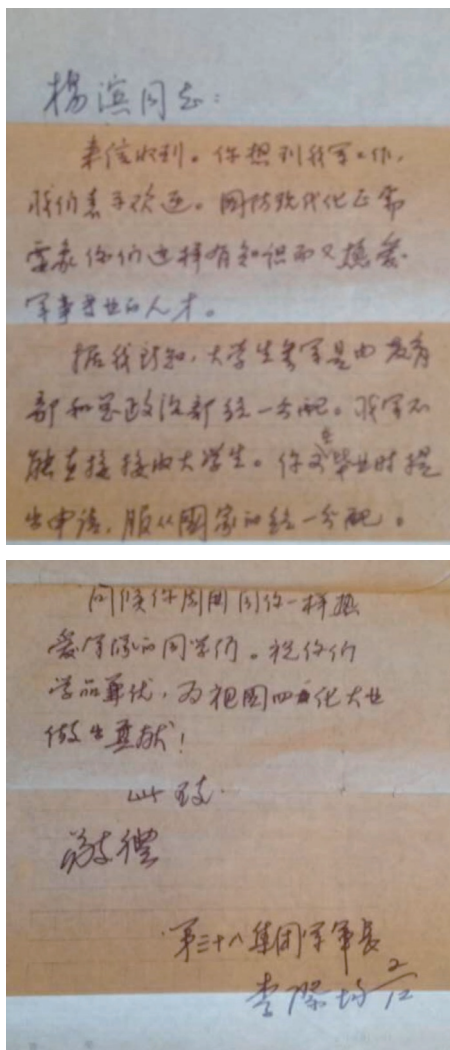
说干就干！于是，我又和付首清骑车到了军科，程老师介绍我们去电教中心。我们选中了一部片子《巴顿将军》。

回到学校后就贴出海报，开始卖票，在电教楼放，票价 5 毛，连放两天。很快卖出了 2000 多张票，火爆啊！

为了维护秩序，除我们兵法部的主力悉数到场外，我还找了我们系 83 级的杨宇，他动员了他们班近 20 人到场。

第一天开始入场的时候，有个老师气势汹汹地来问：我是学生处处长，谁是负责的？我挺身而出，他质问到：谁让你们放录像，还收这么贵的门票？我说上次外语协会放录像也收 5 毛。他又说，公务损坏你们得赔偿。后来，他确实敲了我们 50 块。

这次放录像很成功，上缴给协会 100 块，净赚了 1000 多块，在当时这可是笔巨款啊！陈明星毕业后，协会交给了我，我将协会改名为：清华大学兵法学会。后来，解放军报第一版和八一电影厂纪录片“跨越世纪的红星”还曾对清华兵法学会进行了专题报道。



## 艰难的选择

### (一)

1985年下半年进入大五后，毕业分配问题已摆在了我们面前。我当时对军事非常感兴趣，阅读了大量的军事书籍。如，德国克劳赛维茨的《战争论》，英国利德尔·哈特的《战略论》，德国古德里安的《闪电攻击》，毛泽东军事文选，《孙子兵法》，《孙臆兵法》，希特勒《我的奋斗》等，第一志愿自然是去野战部队指挥打仗，冲锋陷阵，精忠报国，成为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！

为了去部队，我开始各方打探消息，积极联系。因为请过军事科学院的程金明研究员来清华做过讲座，于是第一个就找了程老师。程老师说他只是搞研究的，我们想去野战部队，他爱莫能助。但他又说，从我们院出去一个同志，叫李际均，以前是宋时轮院长的秘书，现在38军当军长，你们可以和他联系。“怎么联系呢？”，我马上问到。程老师只给了我们李军长的通信地址。那时候确实胆大啊！当天晚上，我就给时任中央委员的38军李际均军长写了封信。记得第三天就收到了李军长的回信（去年清理办公室时找到了原件）。然后我给李军长回信，第五天又收到了李军长的回信。

在我们毕业的1986年，国家关于毕业分配的政策发生了许多变化，感觉我们的点有点儿背啊。先是公派出国名额取消了，其次李军长来信告诉我，85年以前38军可直接从地方院校招应届毕业生，但86年政策不允许了，38军招人必须经过北京军区政治部。

后来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的一位干事来学校找过我，告诉我去38军不理想，理想的单位是河北省军区电子室，又能搞技术又能搞指挥。我一听就怒了：要搞技术，我还用去啥电子室吗？果断拒绝了。

后来我和郭祥齐同学专程坐火车去保定拜访李军长。到了38军军部，门卫直接告诉我们李军长不在，去北京开会了。若干年后，我已和李军长成为忘年之交，我向他提及此事，他说他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此事。

我在90年才第一次见到李军长，他已调到北京任军委办公厅主任。那时我研究生毕业后去部队代理连长，代职结束后路过北京，见了我们班同学孙茂松，其父任军办保



密局局长。他告诉我李军长的住址在六里桥军办宿舍。当天晚上我借了唐安东同学的自行车去了李军长家。李军长亲自开的门，问我找谁？我说找李军长，“我就是，你是？”他问道。“原来清华大学兵法学会的杨滨。”我答到。他说知道知道，立刻很热情地把我迎入门内。他爱人正在客厅里看录像（野战排），李军长就把我带入卧室。当晚李军长谈兴甚浓，从 7 点半一直聊到 9 点半，临走时还依依不舍，由此我和李军长成为忘年之交。当时李军长身居要职，军办主任、中央委员，而我只是一个连职上尉。当时李军长正在制定军队改革的宏大规划，现在的军队改革方案依然能看到李军长当时方案的影子。

### （二）

去 38 军未果，我又开始寻找去部队的其他道路。后来听说国防大学开始招指挥学研究生了，我和我们班的郭祥齐同学兴冲冲地骑车到了国防大学，找到了研究生班，结果被告知：国防大学就在 85 年招了一届研究生班，86 年不招了！当时的心情极其失落，我们一字班在清华多上了一年，倒霉的事可都赶上了。

“吾志所向，一往无前；百折不挠，愈挫愈勇。”虽然屡经挫折，但去部队的志向始终未动摇过。得知我爸的老师陈太一（原为总参通信兵的总工，后为南京通信工程学院的副院长）刚刚退休回到北京，我立刻骑车去清河找到了陈老师。还真巧了！通信指挥学院 86 年开始招生军事指挥学研究生，陈老师被聘为客座教授。陈老极力推荐我报考通信指挥学院的研究生，说既可以搞指挥也可以搞技术。陈老还当即给通院夏院长写了封推荐信。我随后也给夏院长写了封信。据说后来夏院长经常拿我的信来教育通院的学员和年轻教师。

于是开始准备报考通信指挥学院的研究生了。记得各校研究生的招生简章都统一挂在人大，我和张朝阳、王龙有天上午骑车去人大看招生简章。中午每人吃了碗面条，张朝阳说他们物理专业有个李政道赞助的奖学金，全国招 50 人，考试进入前 50 名即可。当时真羡慕啊！这事我印象很深，但在前些年（10 多年前了）有次朋友聚会，席间有个朋友提到了张，我立刻吹牛道：我和他是同学啊！我们一趟火车从西安到北京上学的，当年我获得西安数学竞赛一等奖（第一名），物理竞赛一等奖，他对我很崇拜。这个朋友立刻给张朝阳打电话，张说不认识我，后来我接过电话和他聊了半天，包括一起去人大看招生简章的事，他居然都不记得了。我一直没搞明白：对我来说记忆如此深刻的事，张朝阳真不记得了吗？这到底是啥情况呢？说实话，当年我号称神童，真没把他放眼里啊！

### （三）

决定报考通信指挥学院（在武汉）的研究生，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。记得考四门课：高等数学，英语，通信系统原理，综合课（包括计算机原理、电子线路和毛泽东军事思想）。由于通信指挥学院第一次招研究生，而且当时全军都没有军事指挥学硕士学位授予权，为了显示其水平，指定的参考书都是最难的。如通信系统原理指定了最厚的一本参考书（上、中、下三册，作者忘了），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定了《毛泽东军

事文选》(巨厚,包括战役期间各种电报)。吹嘘下,那时学习能力是真强,这些课程都没学过,全部在一个月之内学完,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

记得86年的研究生考试是在寒假期间进行的,考完试到开学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(记忆有些模糊,求证)。学校规定不能回家,但我还是回家了。回西安找了西安交大无线电系的邹理和教授,他同意我免试成为其研究生。但回来后就发生了不幸的事。

这是关于毕业论文的事。之前我们班同学都知道有个特难的课题,叫啥 Karmarka 算法,谁也不愿意做。因为其他课题都是编个程序或做个数据库,怎么也能过关。而算法风险太大了,如不理解可能啥也做不出来,毕业设计不及格,后果很严重。

我已决定去部队,更不愿意做这个课题。没想到回来后就得到了噩耗:老师已经决定就是我做 Karmarka 算法!

我当时就大怒,把班主任戴老师叫到9号楼外面谈话,我开口就质问:“凭啥这么难的题目让我做?我不做!”戴老师说:“你可别这么说话,别忘了你还有毕业分配呢!”“少和我来这套,我就是不做!”然后扬长而去。

后来教研室主任卢开澄教授亲自找我谈话,说:让你做 Karmarka 算法,不是戴老师的意思,而是我的意思,因为其他同学肯定做不出来,只有你才有可能做出来。好吧,我只能做了。

Karmarka 算法是84年由美籍印度数学家 Karmarka 提出的新算法,在运算复杂度上比哈奇扬算法大为改进。当时只有十几页纸的油印资料,其中还错误百出。我的主要精力放在理解算法和更正错误了。毕业答辩时,我讲完论文后,答辩老师提不出一个问题。这完全可以理解,算法太专业了,不经过深入研究是很难提出问题的。卢教授看大家都没有问题,就让我把发现的错误和更正一一列出,答辩就顺利通过了。

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班主任:戴老师和罗老师两口子。当年我年少无知,对两位老师多有顶撞,也犯过旷课等严重错误,两位老师不仅没有整过我,反而对我多加爱护和关照,令我终身铭记。

#### (四)

大约在86年4月,研究生考试结果出来了,我考试通过并接到通知去学院面试。学院领导对我很重视,韩院长、夏副院长和训练部谢部长等将军都亲自和我谈话,鼓励我去学院上研究生。

回来后,还是心有不甘。本来我的理想去搞纯军事的,而且还有其他几个同学也要去野战部队。再继续寻找出路!

听说总政治部干部部是主管部门,于是我和另一位同学(记得是化工系的一位女同学)骑车去了总政。门卫告知干部部在西面的院外一栋独立的楼,我们又骑车去了总政干部部。记得一位穿海军制服的干事(罗干事?)接待了我们。我告诉他我们希望投笔从戎的愿望,他表示支持,并说:能不能统计下清华有多少毕业生愿意去部队?

第二天我们就贴出了海报:愿意毕业参军的请到9号楼418报名。这可惹出麻烦了!第二天就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去工字厅找学生处处长。我一进工字厅就碰到了那位处长(在



杨滨在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前

我们兵法学会放录像时已经打过一次交道了），他劈头就问：“谁让你张贴参军海报的？你这是干扰毕业分配！”我心里一乐：你吓唬谁啊？然后回答：总政治部让我统计的。处长听了这回答，一句话没说，扭头气呼呼地走了。

随后几天来我们宿舍咨询的人很多，但大多数是希望去部队搞技术的，只有我们班的郭祥奇同学和机械系的一位很出色的同学（记得姓韦）希望去部队带兵打仗。

后来我又去总政干部部，明确我们去野战部队的决心。罗干事帮我们联系到了 14 军（在云南）。

上通信指挥学院研究生还是去 14 军？我犹豫很久，最后决定上研究生。郭祥奇和机械系的韦同学去了 14 军教导团（云南蒙自县），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廖锡龙还亲自接见了他们。

以上是我毕业分配艰难选择的过程。如有记忆不准或错误的地方，请同学们批评指正！

杨滨，计算机系 1 班，1986 年清华毕业后考取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研究生，1989 年获全军首届军事指挥学硕士学位，1989~1991 年在通信指挥学院任教员，1991 年调至总参通信部指挥自动化局任参谋，1994 年转业后创办北京德瑞塔科技公司。